

南開哲學

Nankai Studies in Philosophy

(第一辑)

南开大学哲学系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哲学

第一辑

南开大学哲学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开哲学·第1辑/南开大学哲学系编.一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10
ISBN 7-310-02312-9

I. 南... II. 南...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1709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6.625 印张 366 千字

定价:27.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南开哲学》编辑委员会

委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晏清 崔清田 方克立 李建珊 李翔海 刘文英

陆 扬 钱 捷 任晓明 王南湜 薛富兴

主编:王南湜

执行主编:薛富兴

南开哲学 发刊辞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南开哲学》第一辑终于面世了,这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全体师生萦心积年的一份夙愿。

毫无疑问,中国哲学学术(非指狭义的中国哲学)在新世纪的一个根本性任务或使命,就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构中国哲学之精神。这一使命既是由中国社会自身的变迁所决定的,也是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所决定的。一方面,我国目前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然要反映并参与塑造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的全球各文化之间的交往与碰撞的迅猛增长,亦使得在面对全球化时代强势文化的冲击时如何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成了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而哲学作为精神文化的核心部分,更是肩负着重任。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要求哲学有一个根本性的发展和变革。但由于学术工作的累积性的特点,这一时代性任务还只是刚刚开始,整个哲学的状况从根本上来说仍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因而,整个哲学学科所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对传统哲学进行一种创造性的重建,从而为国人构建起一个具有“回家了”的亲切感的新的精神家园。那么,如何进行这种重建呢?我们不能满足于思想的天马行空,而是必须将思想建立于扎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而进行学术研究,便少不了讨论,少不了思想的交流,少不了进行讨论和交流的园地。《南开哲学》正是为此而诞生的。

开辟这块小小的园地,初意只在为全系师生的思想、学术交流提供一个平台,向学界同仁呈现南开大学哲学系师生较为完整、明晰的形象。但是,若我们的这块小小园地,竟也能引起学界同行们的雅兴和关注,继而愿意参与进来,和我们一起思考、讨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岂非人生一大快慰?立足自相勉励,恭候八方群彦。愿我们这块新辟的小小园地,绿草青青,活泼永远。

时值南开大学八十五华诞

南开哲学

目 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

- 陈晏清 王新生 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
——兼论领域哲学的兴起及其意义 1

王南湜 谢永康 历史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 12

李淑梅 市场经济与人的存在和发展方式 23

中国哲学

- 李翔海 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几点思考 31
郑 飞 “负的方法”与“不可言说”
——冯友兰新理学与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方法比较申论 44

胡 艳 简析马祖禅 50

吴 倩 “直觉”与“觉解”
——梁漱溟、冯友兰人生哲学方法比较 57

卢 兴 自我与“他者”
——后殖民语境中本土文化身份的反思与重建 64

西方哲学

- 阎孟伟 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念 71
陆 扬 关于第三空间 86
李国山 专名的由来、分类及用法 94
王建军 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422 页注脚中“我思”概念的阐释 101
牟 娟 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简析 111
臧 勇 论模态逻辑中的“跨界同一” 118
吴童立 维特根斯坦私人语言论证的分析 125

齐艳红 意向性——塞尔论心灵和世界的关系	133
李 娜 追寻失落的共同世界	
——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理论简析	140
逻辑学与科技哲学	
李 娜 对角线方法及有关悖论的逻辑分析	147
任晓明 李旭燕 人=机器人论题的困境与出路	152
张斌峰 辨名与析理	
——张岱年“逻辑”思想述评	161
张晓芒 孔子素质教育思想的逻辑特点	172
牛叔成 从中西方科学思想比较史析中国古代未曾产生科学的原因	180
李建珊 环境问题背景下科技的伦理与价值定位	206
宗教学与美学	
李 勇 中道多元论	
——论阿部正雄的宗教对话思想	214
张仕颖 基督教信仰与伦理道德	223
于 涛 从内在“矛盾”到外在“和合”	
——当代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发展新途径的研究	232
刘洪宇 蒂里希的上帝观	239
薛富兴 人类审美意识的历史进程	246

陈晏清 王新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 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

——兼论领域哲学的兴起及其意义

政治哲学的衰落与复兴

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以哲学的方式探讨政治问题，并试图为这些问题寻求一个根本的解决，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哲学领域。政治哲学也是一种独特的哲学思考方式，它以哲学的方式思考政治问题，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的思考超越表象的生活世界，从而形成一种思入世界和人生根本问题的特殊哲学路径。就其作为一个哲学领域而言，它关注的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因而区别于第一哲学和哲学的其他分支；就其作为一种思考方式而言，它试图通过反思而获得终极的价值和知识，因而区别于作为具体科学的政治学。

政治哲学是一种关于人类应当怎样生活的智慧，因此，它的目标是对政治事物进行善恶之别、好坏之分的价值判断，对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可是，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当以追求知识的严格性和可实证性为目标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逐步确立了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统治地位之后，作为“叙事性文化”的人文话语便日益丧失其合法性。用“事实的描述”取代价值判断，用“科学的理解”取代形而上的追问，越来越成为各个学科的基本准则。在这种情况下，以探讨政治事物的价值和意义、追问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为目标的政治哲学自然也因其言说对象的“不可言说性”而遭到根本的质疑，陷入知识合法性的危机。科学主义的知识论原则坚决否定政治哲学存在的权利。根据这种知识论原则，对政治问题的科学研究只能诉诸实事而不能进行价值判断，更不能诉诸形而上的思辨，因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求真理，必须遵循价值中立的原则，必须以可证实的经验事实为依据。政治哲学的价值判断和形上思考不仅不是认识真理的有效方式，而且会妨碍人们对政治问题的真理性把握。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政治哲学史家列奥·施特劳斯还在对政治哲学的这种窘境大为感慨，他说：“当今，‘政治哲学’几乎成了不是‘神话’也是‘意识形态’的同义语。”¹

然而,20世纪后半叶以来,政治哲学却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复兴。无论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个人权利与公益谁应当优先的争论,还是民族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对全球化的质疑,或是女权主义与生态主义对现代性的挑战,都超越了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精确的政治科学”的范畴,形成一种以考察政治事物的本性与政治事物的应然目的为内容的研究领域和致思进路。曾经被认为已经彻底地遭到拒斥的政治哲学再度兴起。有人甚至说,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已经摆脱了19世纪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的束缚而成为显学,其在英美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分析哲学,成为哲学理论的重要分支。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在英美哲学中已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²。

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表明,一些涉及国家发展方向和世界格局的重大政治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的焦点问题,并极大地影响着哲学家们的思想和研究取向。20世纪以来,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以政治的方式体现出来,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存方式。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试图以“福利国家战略”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调校的努力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直统治着西方社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但是,这种改变的后果并不理想,它在降低传统冲突的可能,为社会大众提供一种更为安全的生存网络的同时,也使福利制度成为逃避劳动的避风港。这导致了令右翼思想家们极为忧虑的“道德公害”(Moral Hazard),引发出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³。而一些左翼思想家则干脆将这种改变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再度封建化”,以喻示这种改变的倒退与失败。无论这些认识是否准确和公允,人们却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这种社会生活的总体性改变产生了一系列新形式的政治冲突和抗争,而且这些冲突和抗争又难以被归入任何一种形式的传统政治冲突,因而难以在传统的政治理念下得到合理的解释。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苏联和东欧社会的剧烈变化、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也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新分化、新格局,市场化取向的社会主义改革也引发了一系列全新的政治问题。例如,在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遇到诸多问题的今天,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究竟应当怎样建设?建设过程中将会遇到怎样的政治问题?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社会的发展将会呈现怎样的趋势?政治活动又将呈现怎样的特征?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现时代的人们不能不关注的。显然,在当代,政治对社会生活的整合和规范作用已显得越来越重要,而且政治对社会的整合方式和规范方式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在这样一个社会生活急剧变动和各种问题相互交错的历史时期,人们迫切需要有为社会整合和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政治理念的政治哲学,去发挥它对社会的导向和规范作用。这是政治哲学之所以会在当代复兴的最根本的原因。

时代的需要无疑是政治哲学复兴的根本动因。然而,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却不能仅仅归因于时代的现实需要,亦当追溯到政治哲学自身的性质及其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因为正是这两方面的问题曾使它一度陷入了危机和困境。

政治事物始终是人类关注、思考和言说的对象，但是，在不同的学术视域内，人们对政治事物的思考方式和言说方式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正是思考方式与言说方式的差异，构成了具有共同关注对象的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根本区别。

就思考方式而言，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差异体现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关注政治事物。政治学关注作为经验事实存在的政治事物，关注政治事物的具体表现、政治活动的具体过程。因而，政治学主要是通过对政治事物的经验性研究而把握政治活动的过程、公共权力的存在形式及其运作规律等。政治哲学则关注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关注政治事物的价值指向和政治活动的应然规范。因而，它主要通过对涉及公平、平等、正义、自由、民主等基本社会价值的研究，把握政治评价的基本准则；通过对政治事物总体性特征的反思，把握它的内在本性。规范性活动的核心是“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因此，政治哲学对政治事物的价值论研究就是要对人类应当怎样生活，或者说对人类生活的伦理目标进行哲学的追问。这种追问是哲学的，因而是终极的。它所要追问的不是政治事物的具体目标，而是由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决定的政治事物的终极价值。离开了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无所谓其终极价值；离开了政治事物的终极价值也无所谓其内在本性。关于政治事物之内在本性和应然规范的研究是内在统一的。就是说，政治哲学是对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和应然价值进行双重的终极追问的学问。关于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的终极追问是政治哲学的本体论，关于政治事物的价值的终极追问则是政治哲学的价值论。因此，政治哲学往往并不诉诸具体科学探讨问题的方法，而会诉诸理性的思辨乃至道德直觉。当代政治哲学史家金里卡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要求政治论辩成为逻辑论证不过是误解了这项事业的性质。”⁴ 例如，关于平等待人的理念是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任何政治哲学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辨明这一理念，因此，对当代政治哲学而言，“问题的实质在于：哪一种形式的平等待人最能够把握平等待人的精髓？这可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下述复杂问题的回答：究竟什么是人性以及什么是人的利益（Interests）所在。要确定哪一种具体形式的平等待人最能够把握平等待人的精髓，我们并不需要只是精通逻辑推演的逻辑学家。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他能够深刻理解人性，懂得为什么人应该受到尊重和关心，明白哪些行为最能展现这种尊重和关心”⁵。

就言说方式而言，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不同体现为哲学语言与科学语言之间的差异。由于当代哲学在语言哲学中的特殊进展，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区别其实更多地通过言说方式上的差异体现出来。或者说，由于当代哲学将本体论问题转换为语言问题，政治哲学对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和应然价值的探讨，主要地通过政治事物内在本性和应然价值的可言说性——即语言问题——凸显出来。政治哲学与政治学虽然都是以人类的政治生活为言说对象的政治话语，但是，与作为科学的政治学相比，政治哲学因其言说对象的特殊性而成为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⁶。正是由于这种言说方式的特殊性，作为一种古老政治话语的政治哲学



曾一度被认为言说了“不可言说者”而遭到现代学术的拒斥。的确，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和应然价值并不是一个可以经验的事实，因为无论是“内在本性”或“应然价值”都是非经验和非事实性的存在。它们虽然可以被我们所谈论却不可以被我们的经验理性能力所把握。对它们而言，“看”只能是一种思想隐喻，“说”只能是一种思想之事，而绝非与事实相关联的经验。它们只能是一种与政治事物的总体性和终极性存在相关联的思想性状，而不可能是事实和经验。因为总体性本身不是可以经验的事实。因此，在以经验理性为依靠的现代科学的言说方式中，它们作为一种人类想要言说的对象，就成为无法被言说的“神秘的东西”。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正是这种曾经遭到贬抑的言说方式的复兴，它要复活的正是那种对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和应然价值进行言说的古老话语。

就思本身而言，哲学是一种反思性的理论活动，而“反思”就是对“思”之思，因此，它研究的是“思”的条件与意义。所谓思的条件，就是指怎样才能够合理地思，是指合理的思在何种条件下是可能的。具体的科学并不关注思的条件，只关注思的对象以及思与其对象之间的一致。任何一种思想，只要它超越了具体的思而思思之条件，就是一种哲学之思。关于政治之思也是如此。所谓思的意义，就是指为什么要思，是指思为什么是必要的，因而它最终将成为一种价值追问。具体的科学并不关注思的必要性，只关注思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因此也不必关注思的价值。任何一种思想，只要它超越了具体的思本身而思思之必要性，它就是一种哲学之思。思考思的条件，就是对思的可能性的本体论追问；思考思的意义，就是对思的应然目的的价值性评判。这二者都是哲学的追问。这些追问不以具体的事事实经验为对象，因而不产生具体的知识，只是限制思考、引导思考的路向。

政治哲学不是直接地研究现实的政治事物，而是对政治思考的反思，是对政治理论的基本理念、规范、准则得以成立的条件及其价值的再思考，即关于政治之思的条件和意义的反思。所谓反思政治理论得以成立的条件，就是要澄清政治理论中相关范畴、理念和准则确立的基础和前提。例如，以英美语言哲学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政治学的语言进行分析，从而使政治学的研究能够在一种合理的基础上进行。它并不研究政治行为本身，而是要为研究这种行为本身的政治学提供一个基础。所谓反思政治理论的意义，就是要以一预设的人类生活的应当目标为基准，判别不同政治理念及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的好坏、善恶、正义与非正义，判别它们对文明的人类生活所具有的价值。无论是对思的条件还是对思的意义的反思，都是有别于实证研究的政治哲学的研究。因此，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事物的本体论的学问，亦是关于政治事物的规范性理论。

当然，政治哲学的思考方式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政治哲学中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对“政治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追问。但是，追问政治是什么的问题有一个方式问题，即思人此问题的路径的问题，而这一方式和路径在不同的时代里是不一样的。在古代，这一问题是一个可以被直接谈论的本体论问题；可在当代条件下，当传统的形而上学已经遭到持续而有说服力的批判之后，对这一问题（以及其他所有的哲学问题）不再像古代哲学一样采取一种直接性的态度，将其作为一种直接的本体论证明去对待，而是将其转换为一种限定思的条



件的思考。当代的分析哲学其实就是通过对语言和逻辑的分析而澄清思的条件；澄清人们可以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什么语言条件下谈论这一问题。罗尔斯对公正、正义的分析因循了古代政治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因而，他的《正义论》的问世被看作是政治哲学在当代复兴的标志。可是，罗尔斯却是在接受并利用了当代分析哲学的成果的基础上构造其政治哲学体系的。他的正义论研究虽然冲破了20世纪以来的伦理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强调研究实质性道德观念在政治哲学中的中心地位，可是，却不再以预设一个当然的道德结论为起点，而是力图避免古代政治哲学的这一独断论的思入问题的方式。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政治哲学的研究必须时刻站在现代哲学所构筑的语义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论基础之上，通过对语言和逻辑的小心分析和对不同道德观念的反思平衡得出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正义、公正之思的语言条件的澄清。和古代政治哲学一样，罗尔斯的这种公正、正义“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的研究，是对政治观念的善恶判断和应然态度的哲学反思，可是，他却完全是以现代的方式阐述问题的。

一种特殊哲学形式的再生

政治哲学不是一般的哲学，而是以政治事物为研究对象的，就此而言，它是一种特殊的哲学形式。政治哲学与一般哲学的区别在于，它是从人的本性问题出发说明人类活动秩序的问题，而不是对世界的本质、世界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一般的理论追问。也就是说，由于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事物的一种哲学反思，因此既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又区别于其他领域哲学。政治哲学与第一哲学之间的这种区别是显见的，但是，这里所要指出的并不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而是要辨明究竟是什么使得政治哲学成为一种哲学，因为只有进行了这样的辨明，才可以解释它为什么会衰而复兴并成为哲学在当代的一种言说方式。笔者以为，政治哲学之所以能够在当代复兴并成为哲学研究中的一种显学，并不是因为它所关注的领域的特殊性，而是因为它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切入哲学的根本问题，因而以一种切中当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方式，为人们理解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提供了一种独具价值的反思路径。

近代之后，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知识原则不断扩张并取得了节节胜利。可是，经验理性的“胜利”并没有像它所期望的那样，为哲学和社会知识的有效性寻找到一个普遍的理性基础，反而在实践上导致了“社会的技术化统治”和“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在一个被充分技术化和“合理化”的世界中，经验理性正在以新的物化方式塑造着个体和社会的生存个性，塑造出一个非人化的生活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切超越性的关怀和价值性的诉求，均因其不可与可实证性的经验知识相通约而被贬斥为“非理性”，被排除在“合法知识”之外。可是实际上，世界的“技术化统治恰恰是经验理性这一“合法知识”的单一性扩张所导致的。想要克服意识形态的经验理性自身却变成了一种独大的意识形态，想要排除非理性的实证性知识自身却变得恣意狂妄。怎样在经验与理性、真理与价值、实然与应然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怎样既使现实世界接受生活意义的指引，又使理想世界接受经验理性的限制，从

而避免它们在世界秩序建构中产生单一性的膨胀？对于当代哲学家来说，这已经成为最大的理论困惑。政治哲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复兴的，因为它的问题域，它切入生活世界的独特视角，以及一直延续的对现实世界的理想性关怀，使它无可替代地成为解答这些困惑的最佳方式。作为对于政治的内在本性和应然价值的哲学反思，政治哲学关注的是政治价值观、理想的政治模式和政治规范的理论基础。这就决定了它的批判锋芒直接指向了经验理性的单一膨胀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困境；决定了它不像一般哲学那样远离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像有些领域哲学那样缺乏价值评判的视野，而是直接切入人的当下生存状态。它不仅从一个不同于政治科学的侧度揭示了经验理性的困境，凸显了辩证理性的价值，而且从一个不同于其他部门哲学的侧度彰显了哲学在解决当代人类生存困境中的独特价值。因此，理解政治哲学的复兴，也将会为我们理解当代哲学的发展脉络和致思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哲学，提供一种进路和致思方式。

时下，人们非常热衷于谈论哲学自身的转向问题，其实，第一次真正的哲学转向就是从自然哲学向智者派哲学的转向。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中，出现了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关注人和人类社会问题的哲学。这实际上就是政治哲学的开端。从政治哲学的这个开端里，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政治哲学与哲学之间难以说清的关系。古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本体论问题，那么，苏格拉底等人之所以要从研究宇宙、自然的本性的问题转向人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不再关注世界“存在”的奥秘？这是不是仅仅意味着问题域和研究对象向“人”的一种转向？并非如此。对于苏格拉底来说，研究关于人的哲学，研究关于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政治哲学⁷，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世界终极本体问题的考察，而是要通过对人这种特殊存在及其社会生存方式的考察，合理地深入到世界存在的奥秘。因为对于人来说，最基本的存在就是人本身的存在，而政治的生存方式则是最能体现作为社会动物的人之本性的生存方式（至少古代希腊人这么认为），只有通过对这种存在和生存方式的把握，才能合理地思入存在本身。对于古代哲学而言，达到了对存在本身的把握也就是把握了终极的真理，这是哲学的使命。虽然苏格拉底宣布人不可能像神那样最终把握存在本身，但是，这恰恰表明了他怀有强烈的形而上的哲人冲动，他的这种“谦逊”只是表明他在努力寻找一个合理的切入点，而不意味着放弃终极关怀。所以，以人类的政治事物为研究对象，并不是不关注一般的哲学问题，而是为了从一个更为真切的路径出发去探究一般的哲学问题。

可见，政治哲学的特殊性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其研究领域的特殊性，这一显见的特殊性只是表面的。政治哲学不能被理解为哲学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而应被理解为哲学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被理解为解决根本哲学问题的一种特殊方式。只有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我们才能同意把政治哲学称为领域哲学。换言之，政治哲学并不是关于政治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而是通过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世界本性的学问。在这里，政治事物不仅仅是一个特殊的场域，更是思入人生和世界切要问题的一个特殊视点。

讨论到这里，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视角的切换，把目光投向标示着当代哲学重要特征的领域哲学的兴起问题，因为在这一更为宽阔的视域内，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当代政治哲学的

复兴。

领域哲学的兴起及其意义

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使得直接的本体论追问成为不合理的理性僭越，也使得以此为基础的体系哲学的建构成为不合时宜的宏大叙事。因此，从现实的人出发，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出发进行哲学之思就成为不同形式哲学的当然归宿。

现实的生活世界不是一个抽象的整体世界，而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的总体世界，因而当代哲学也必然是多视角的。不同的视角从不同的维度“看”同一个总体的世界，以不同的方式“说”同一个总体的世界，形成了当代哲学中不同的领域哲学。政治哲学只是众多领域哲学中的一种。更为一般地说，不仅政治哲学，而且一切当今的领域哲学如科技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等，实际上都是哲学的当代形式，它们以不同于体系哲学的方式，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对现实生活进行着总体性反思。

既然当代的领域哲学是一种面向生活世界的哲学之思，而不是源自哲学家头脑的纯粹思辨，那么，任何一种领域哲学都不能离开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而自言自语，否则就会再度走进旧哲学抽象地构造体系的理论循环。不过，对哲学而言，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对现实的生活进行一种哲学的关注和言说，这是理解领域哲学与生活世界之间关系的切要之处。表面上看，从生活世界各个领域的现实出发研究现实的问题，这似乎就是当代的领域哲学突破旧哲学的最好方式。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哲学对世界的把握以总体性为对象，以反思性为特征，以终极性为目标，因此，并非现实中的一切都可以成为反思的内容。具体的知识直接来源于现实的生活世界，而哲学的反思则是对这些具体知识的再思考而不是具体知识本身。哲学思维的这种特征使它与现实的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张力：哲学既来源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就是说，只有当思想活动超越于特殊领域的现实以及关于这一领域现实的具体知识之上时，它才指向总体性和终极性，才成为哲学之思。应当说，在当前的哲学发展中，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应当从现实的生活出发，甚至意识到应当从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出发拓展哲学的新视野，但是，由于领域哲学尚处于幼稚期，人们往往还不能真正地把握到各个领域中的根本性、总体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将不同的领域知识等同于领域哲学，将领域哲学看作是第一哲学在具体生活领域中的运用等认识，还或者隐蔽或者公开地存在于关于领域哲学的形形色色的理解中。因此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并不赞成将当代哲学看作是各个领域哲学相拼加，或将领域哲学看作是当代哲学的组成部分。考虑到汉语的表达习惯，我们愿意继续使用“领域哲学”这一概念来表达当代哲学的多层次和多维度特征，标示它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紧密关联，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我们赞成将领域哲学看作是哲学在某一领域中的展开，或者将领域哲学看作是对某一领域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在严格的意义上，领域哲学应当被看作是哲学的一个特殊的维度、特殊的视角或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而不是哲学的一个领域或层面。

无疑，哲学具有不同维度上的区分，例如，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中，就既具有历史哲学的维度，也具有社会哲学的维度。但是，哲学思维的本性决定了即使是领域哲学的维度也必须是以超越性的、总体性的和反思性的方式与现实生活发生联系的。就像唯物史观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一般原则在历史领域中的应用和推广一样，当今兴起的各种领域哲学也不能被理解为“元哲学”在某个特殊领域中的应用。当代兴起的各种领域哲学都是以它们特有的方式对人类生活所面对的根本性问题的哲学回答。正是因为如此，领域哲学才能够被称为哲学。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实践转向和领域哲学的兴起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当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的讨论告一段落之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领域哲学纷纷兴起，其中，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等领域哲学的讨论异常热烈。这实质上是强调哲学“实践转向”的结果和表现。重新强调哲学的实践转向标志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走出了最初冲破旧体系坚壳的阶段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此后的发展将是一种新的体系的建立吗？当然不是。如果没有不同领域哲学对生活世界的特殊诠释，实践转向最终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当今已经兴起的各种领域哲学，实际上就是在以一种新的方式继续阐释过去理论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这是对实践转向过程中所提出问题的新的言说方式，也是继续研究新问题、创立新理论唯一可能的路径。哲学的实践转向之所以被重新强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哲学的研究在原有理论框架内难以展开和深入，只有在做了重新强调“实践转向”这一“返本”工作之后，才能使它在直接贴近现实生活的各领域哲学中得到“开新”。由此可见，在“实践转向”与“领域哲学”的关系上呈现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返本”与“开新”之间的相继，并非是由于实践的原则在领域哲学中的应用所致，而是因为无论“返本”还是“开新”，都立足于一个共同的基础——关注现实的生活。这一现实立足点的重新强调，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言说生活世界的领域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另一方面，实践转向只是重新强调的马克思哲学的总特征，而各个领域哲学则是从不同的侧度对这一总特征的深度诠释。只有通过各种领域哲学的深入进展，才能使体现这一总特征的马克思哲学获得真正深入的推进。

近些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旧解释体系的解体，我国学界针对哲学的走向创造出无数种新表述，但是，这些新表述大多朝生夕死，前后相替，缺乏持久的生命力。这是一种浮躁的哲学状况，是挣脱束缚后的躁动不安和茫然无措。这种哲学状况说明了什么？是因为哲学尚未意识到突破旧哲学必须立足于现实的生活世界吗？大概不能进行这样的归结。笔者以为，症结在于哲学切入现实生活的结合点尚未生长起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在于领域哲学的发展还处在不成熟的阶段。实践转向和领域哲学只能在相互推进中互相“催熟”。当实践转向尚未发生之时，领域哲学固然不会出现，但是当领域哲学还不能深入地反思现实生活中的总体性和根本性问题时，“实践转向”也只能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表述虽然也强调立足于现实的生活，却往往只能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而无力说明这种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与现实

的生活世界具有一种怎样的关联。它们虽然也强调反对体系的建构，却又总是试图用一些“有解释力的”新概念抽象地解释一切，不关心或无力从当代生活的多维视角出发透视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这说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尚未从根本上摆脱体系哲学的宏大叙事冲动。仅仅空洞地强调实践转向并不意味着哲学转向了现实的生活，只有通过对涉及世界和人生的各种根本问题的反思，才能真正切入现实生活。而这些根本问题不存在于别处，只存在于各个领域的现实生活之中。

人类之需要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在于需要人类生活意义的终极关怀，所以人类永远不会停止形而上的追求，这是第一哲学的功能。只是在当代哲学中，已经不存在一种以体系哲学的方式而独立存在的第一哲学，而是要由各领域哲学上升为第一哲学，担当原本由体系哲学担当的第一哲学的功能。这就是各领域哲学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对人类的生活作出总体性和终极性的解释，从其特有的视角关怀人类的终极命运。人类生活的终极问题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人类的命运亦系于人类自己对这一根本性问题作出的解答。各种领域哲学最终都要从其特定的视角出发回答这一问题，从而使自己上升为第一哲学。只有从自己领域独有的视角出发回答这一问题，它才有自己的“领域”特色；也只有最终回答这一问题，它才能称之为哲学。亚里斯多德曾经说“人是政治动物”，也说“人是社会动物”，还说“人是道德的动物”；近代思想家说“人是理性的动物”，马克思说“人是从事劳动生产”的动物；当代思想家则说“人是能够使用语言符号的动物”……这些不同的表达其实就是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对人、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人的自由的终极理解。它们虽然对人之本性进行了不同的断定，但相互之间却并不相悖；领域哲学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对问题的终极理解，它们之间也不相悖。例如，道德哲学从人的伦理性存在和伦理关系出发解读人类生活，解读人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社会哲学从人的社会性存在和社会交往出发解读人类生活，解读人的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政治哲学从人的政治性存在和政治交往出发解读人类生活，解读人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哲学的解读，都是第一哲学的不同表达方式，都是从不同的视点切入了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

近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倡导和关注的社会哲学的研究，就是基于上述对领域哲学的理解。现在我们提出关注政治哲学的研究，同样是基于上述理解。而且，从实质上说，关注政治哲学的研究，并不是研究方向上的转变，而是原来研究方向的深化。如上所述，社会哲学是从人的社会性生存出发解读人类生活，政治哲学是从人的政治性生存出发解读人类生活，而人的政治性生存可以说是人的社会性生存的集中体现。因此，广义的社会哲学就应当包括政治哲学。

结语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已经越来越呈现为一种趋势。从历史上看，这一趋势的出现和发展最初无疑是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的。可是，全球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而是一个充

满矛盾、风险和冲突的社会变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价值观念将会受到强烈的冲击。其中，个人对传统政治价值认同的淡漠和传统秩序的消解将构成最为突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这一问题在当代的凸现表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个人和社群对传统的政治价值和实践行为的认同在发生转变，说明在现代社会中人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归属在发生着转移。这就是说，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正在努力地寻找和构建自己的现代家园。那么，这个家园的构建应当遵循怎样的正义原则？这种原则来自何处？这个家园会在怎样的意义上具有政治的性质？人们会在怎样的意义上接受政治活动为他们构筑家园的活动所作的安排？与此相关，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应当以怎样的方式介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它们实际上又会怎样介入人们的社会生活？这些问题的回答不是哪个民族的事情，也不是哪种文化的事情，而是生存于现代世界中的全人类的事情。或许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对此会有不同的回答，但这些回答都无法离开政治哲学。实际上，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正在复兴的当代政治哲学所致力于回答的问题。

当今的中国不是一个孤悬于世界和时代之外的封闭社会，因此，只有在全球化联系的背景和世界历史的现代性视野之下，才能深入地把握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内在本性。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已为世界所瞩目。与此同时，我国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必将在相应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否则，我们就将面临难以数计的无法靠经济发展解决的社会问题。从既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工业化所标示的物质文明并不能自动地导出一个社会中政治制度的文明和精神文化的文明，工业化的畸形发展甚至有可能成为一种隐藏在现代化之中的反现代化力量，造就一个技术统治的、反人性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说，没有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和与之相关的精神文明，就不可能有物质文明持续健康的发展。然而，政治文明的建设不只是政治制度的文明化和现代化，而首先是政治理念的文明化和现代化的更新。这就要求我们从时代的生活出发研究政治哲学，从当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特质中，把握当代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的根本性问题，认识当代生活的内在本性，提炼出符合人类理想并契合时代需要的政治理念，以指导生活实践。这是哲学的任务，因而是政治哲学的任务。只有把握住了这一任务，政治哲学才能以其特有的方式点燃哲学，并以哲学所特有的方式照亮生活。

注释：

- 1 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上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 2 参见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
- 3 参见吉登斯《第三条道路》，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9页。
- 4 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6页。
- 5 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第84~85页。
- 6 虽然亚里斯多德曾将一切研究政治问题的学问都称之为“政治科学”，但在当代的语境